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教育智库
Thinktanks

2024年06月刊

总第70期



P37 论坛实录：

2024桂林·长江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 01 在“2024 桂林·长江教育论坛”上的致辞 孙杰远

院长视点

- 04 当前教育热点问题：症结与对策
20 ChatGPT 对教育生态的冲击及应对策略

论坛实录

- 37 2024 桂林·长江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

院内动态

- 58 周洪宇院长受邀参加第二届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培养学术论坛
63 周洪宇院长受邀参加南京“八〇九〇后”基础教育优秀青年教师学术沙龙



欢迎与我们互动

在“2024 桂林·长江教育论坛” 上的致辞



孙杰远

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常委、校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广西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

尊敬的周洪宇院长，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老师、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相聚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共同出席“2024 桂林·长江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学术研讨会”。

首先，我代表广西师范大学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校特别是教育学部建设发展的各位领导、专家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教育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理论实现重大创新的历史基础、现实前提和逻辑遵循。中国教育学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根本要义就在于基于中国教育现代化而推动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建设，亦即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梳理和理论升华，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规律做出科学阐释和系统建构，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未来趋势加以合理研判和正确描绘。

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去、当下及未来”，作为教育研究者，我认为还需要学界同仁携手开展广泛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深化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在这里，我想着重跟大家交流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追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土思想起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关键，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需要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去追根溯源，尤其是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中西教育现代化思想激荡，理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教育现代化思想基因，赓续中国教育现代化思想根脉，让中国教育现代化思想的历史恒久性愈证愈明，并实现西式教育现代化的超越。

二是直面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点难点问题。中国教育现代化就是要聚焦教育现代化的本质问题、基本问题与核心问题，总结归纳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实践与探索，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中国式解答”。特别是要对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所实现的理论创新进行集成性提炼和概括，讲清楚中国教育现代化理论创新之于世界教育现代化的独特贡献。回答好“中国教育现代化何以可能”的问题，着力阐释

清楚中国教育现代化对已有西方主导的教育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超越性与未来性，特别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对既定教育现代化模式“内在悖论”的化解之道、之法、之技。

三是展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改革路径。中国现代化要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中来，以中国教育现代化助推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进一步阐明中国教育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教育现代化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中国教育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基于丰富的教育实践探索，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做出体系化、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全面澄清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中心任务、价值体系、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对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主要内涵做出新的科学阐释，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原则、重大原则与方法论做出全面阐释。

各位同仁！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助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我相信，通过本次论坛，我们定能在交流中激荡思想的火花，在探讨中创生学术的硕果！愿我们广大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勇毅前行，驰而不息，共同奋进中国教育现代化新征程！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嘉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当前教育热点问题：症结与对策

来源 |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03期

最近这几年教育问题为社会所普遍关注，是当前的社会热点、焦点之一。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今中国改革已进入到深化期，与以前相比，改革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当今的时代，可以说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也可以说是教育改革的矛盾凸显期。尤其是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时刻；其次，从教育自身来看，像教育管理、教育投入、高校招生等一些体制性的问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一些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如德育教育等问题也凸显出来。此外，近几年来教育决策上缺乏民主性、科学性，也使这些问题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最后，从民众的层面来看，一方面，人民要获得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逐渐进入独生子女时代，人们对教育的关注程度也进一步增加。同时，在传统媒体空前繁荣，而新

媒介如互联网又不断普及的情况下，人们关注和评论教育问题也更为便利。例如，在四五年前，中国的互联网网民只有大约 5 千万，而现在已达到 1.3 亿左右。因此，当今的时代是全民关心、评论教育的时代。

当前教育的热点问题，大致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热点多且争议大；第二，此起彼伏不间断；第三，重外轻内不平衡（即对体制性、政策性的外部问题关注多，而对课程、教材、教法等内部问题关注少），第四，顽疾重而难解决。

目前教育的热点问题较多，本文重点讨论教育乱收费问题、教育投入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和义务教育免费问题。

一、教育收费问题

2002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全国组织部署了教育收费专项检查工作，检查发现，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及各级行政部门乱收费现象依然严重。根据对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初步统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共对 63484 所大、中、小学和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了重点检查，查出违法收费案件 12634 件，违法收费金额高达 21 亿多元。乱收费的项目，可谓五花八门，有捐款、补课费、赞助费、复习费、集资费、搭车收取农业费、危房改造费等等。2004 年 3 月，笔者曾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的建议》。时隔两年之后，教育乱收费的现象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仍然是人民群众关心和议论的社会焦点之一。

产生教育乱收费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对教育投入总量严重不足，导致许多学校为了生存而乱收费。长期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所占 GDP 的比例偏低。政府的投入不足，自然逼迫学校为了生存不得不想方设法筹钱，这里边就包括乱收费。可以说这是目前教育乱收费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教育政策导向失误，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失灵，教育行业非均衡化日益突出。这种非均衡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教育主管部门在分配经费时，往往向大学、城市、城市中的重点学校、

示范学校倾斜，从而使上述现象更为严重。名校是一种稀缺教育资源，一种资源越是稀缺，其市场价格也就越高。这些少数学校垄断了全国的优质教育资源，择校也主要发生在它们中间。一方面是供给有限，另一方面，对名校的需求却又异常旺盛。在一个竞争激烈、就业不易的社会里，家长为了孩子将来能够顺利找到一份好工作，尽其所能让他们得到最好的教育，这就必然导致供给与需求的极不平衡、择校的不可遏制以及收费的不断攀高；三是教育行业垄断严重，若干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名牌公办学校校长和教师客观上已形成了一个共生共荣的利益共同体。

由于以上原因，治理教育乱收费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奢望短期内根治。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治本和治标两方面同时入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首先，各级政府要真正认识到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战略地位，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做好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工作。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应重点做好教育行业发展的规划和依法对行业（主要是各类学校）进行动态、有效的监管工作。要从根本上切断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教育机构的利益关系，使管理者真正做到依法管理、公正执法，从而确保中国教育事业快速、稳定、持续和有序的发展。教育依产品性质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半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非公共产品三种。纯公共产品不是指所有的教育，而是指义务教育。所谓纯公共产品就是这种产品的使用、享用没有竞争性，也没有排他性，这就是纯公共产品的含义。一般来说，纯公共产品的教育应该由政府所提供，是政府的责任，必须由政府提供。如果民间提供这个产品则不能有附加条件，在义务教育阶段欢迎民间资本介入，但不能盈利。世界各国基本都是这样。

高等教育则属于半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半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是指它虽是公共产品，但它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一般来说，半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主要为政府提供，但是享用这个公共产品的个人、家庭或者单位机构也应该分担部分责任，所以这些半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实行的是成本分摊机制，国家还是提供这个产品的主要责任人，因为它毕竟还是一种公共产品。像教育这种

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对它的这种提供有助于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增强国家的竞争力，所以往往是由国家来提供的，整个民族的素质提升要靠它保证。但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产品性质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不是把公共产品或者说把纯公共产品当成准公共产品，就是把半公共产品当作纯公共产品。

回顾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不收费的。本应由享用者分担的部分成本，一直由国家来提供，而且国家乐于提供。国家是把大学生当作国家干部来培养的，不计成本，全额承担，就像今天的干部培训一样。然而令大家印象深刻的是义务教育这种纯公共产品，本应是由国家承担责任的，但是在2002、2003年税费改革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却由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基层承担了很大的责任。2001年国家有关部门曾经做过一个调研，调研发现：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分担的比例方面，乡镇以下主要是老百姓承担，占78%，而县以上只承担了22%。在县级以上，中央财政只承担了2%，其他的都是省里面和市里面承担的。这说明由于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义务教育这种纯公共产品的性质认识不足，没有把它当作政府应该主要承担的责任，反而交给老百姓去承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最弱的肩膀扛起了最重的担子”、“小马拉大车”。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应该尽快改变。

其次，应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可支配资金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依法逐年提高，力争在本届政府内（即2007年底）达到4%的指标。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切实做到“三个增长”。要改变教育投入的结构，调整教育投入的方向，重点投入到基础教育方面，特别是义务教育方面，要将更多力量用于治理薄弱学校，改善薄弱学校和条件较差的名校的办学状况。这应是加大投入、调整投入的方向和重点。

其三，应重新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教育体系，从根本上打破教育行业垄断。积极改革教育投资体制，扩大教育投入的主体。我们现在的教育主要是公办教育，民办教育还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就形成了一种公办学校的垄断地位和格局，而这对于教育的发展，对于满足老百姓的需要是不适用的，必须尽快改变。要鼓励有远见、有使命感、有责任心、有实力的民营资本和社会力

量，对一些不适应社会需求、濒于关门的教育机构进行兼并；积极扶持和大力发展民办学校，适当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准入门槛，逐步废除审批制，实行审核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还要开放境外办学机构在我国办学的限制，让他们参与国内教育市场竞争，打破现有公立学校一花独放、一枝独秀的垄断局面。要做到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校；公办无差异，民办有区别；公办保公平，民办求效率。降低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成本，满足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家庭条件者的不同需求，形成公办与民办、本国与境外等各种办学组织、办学形式有序竞争、协调发展、各个社会阶层各得其所的新教育格局。

其四，应按照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取消基础教育阶段现行的重点学校或所谓的示范学校，加快基础教育阶段标准化学校建设，停止审批和兴建基础教育阶段高标准、超豪华学校的项目。要在学校内部真正建立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形成有进有出、合理流动的教师人才市场，改善薄弱学校的师资条件，实行名校与薄弱学校校长、教师对口交流制，定期轮岗，待遇不变。特别是加强农村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要改革地方政府对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对教师的评估标准，把评级改为评学校的办学合格度，把评改革、评创新、评特色、评成长力和发展潜力等作为评估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教师的主要指标。

其五，要严格依法办事，真正做到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为了做好学校的收费工作，应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文以及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对统一的收费标准。相对统一，不是北京和武汉完全一个标准，而是同一个地区内的统一。在制定标准前，应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开前门，堵后门，合理收费。所有收费应一律对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还要注意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物价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对教育乱收费现象，真正分清性质、责任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其各自的责任，真正落实问责制。

二、教育投入问题

在教育投入方面，我们国家的教育投入，应该说一直是不足的。尽管政府也

采取了很多措施，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从我国教育发展的需要来看，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近年“两会”上，很多代表和委员都呼吁要加大教育投入，希望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早日达到4%。这主要是因为，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这个比例是怎么确定的呢？它主要有两个参考系数。一个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当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金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这个时候就达到了4%。另一个参考系数，就是鉴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对于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来约定的。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资料显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即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低收入的国家，也就是现在像尼日利亚、刚果、埃塞俄比亚、尼泊尔等国家，对教育投入平均在3.1%。中等发达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为4.3%，高收入的国家平均为5.7%。这是平均数，有的发达国家已经达到7%~8%。

那么从1993年起到今天，我们的教育投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材料表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后，就没有哪一年达到4%，基本上都在两点几左右徘徊。比较起来，情况最好的一年是2002年，那个时候达到了2.9%。之后又往下降，2006年的数据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可以肯定，至多也就在3%左右。从投入的情况来看，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就会发现政府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而不是一般的不足。

投入不足是一个问题，在已有的投入里面，支出的结构不合理是另外一个问题。从1997到2004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额分配格局的变化是：高等教育在教育经费支出里面所占比重持续提高，从原来的17.2%提高到31.2%，提高了整整14个百分点，同时，中等及技工学校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从1997年原有的10%降到4.3%，下降了5.7个百分点。中学所占比重从原有的3.4%下降到3.35%，比重下降了0.05个百分点。小学所占比重也持续下降，从原有的33%降到24.9%，下降了8.1

个百分点,下降的幅度也是相当惊人的。特别是农村小学所占比例是持续下降态势,从 20.1% 下降到 14.8%,下降 5.3 个百分点。

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重持续增加,也不是所有的高校都由于这个增加而受惠。尽管国家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但是在高等教育里面,高校得到实惠最大的是所谓“985 工程”学校,特别是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

北大、清华两校为了搞“985 工程”,教育部、财政部当时研究给这两个学校一年 6 个亿。就是在原有的经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每年新增 6 个亿,三年 18 个亿,北京市也相应匹配。中央给上海交大、复旦大学 6 个亿,那么上海市也匹配 6 个亿。中山大学地处经济发展良好地区,中央给他 6 个亿,地方政府匹配给他 9 个亿。其他经济不发达省份的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贷款,或靠收费。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高校为了自身的发展贷款了 2 千多个亿,全国高中近几年来贷款也近 1 千个亿。换句话说,高中、高校这个半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为了生存和发展贷了近 3 千多个亿。

除了“985 工程”学校,“211 工程”学校也得了一些实惠,但是其他高校没有得到什么钱。反过来,近几年由于扩招,大学生增加了,但教育经费并没有相应增加,结果生均教育经费反而降低。湖北省属院校生均经费现在是 2300 元左右,2000 年时还在 3600 元左右。可是一个学生的培养成本,文科生一般来说在 1 万 2 到 1 万 5,理工科要更高一些,特别是工科。怎么办?学校只能通过收费或是贷款补充办学经费。但贷款有贷款的风险,高校贷款风险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极大的问题。

如果从 1993 年到今天,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能够实现 4%,那么我们现在给教育的投入可能要多增加 6000 到 7000 亿。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高中向银行贷款大约是 1000 亿左右,高校由于现在扩招、发展,扩大规模,向银行贷款 2000 多个亿。也就是高中和高校这一块,学校自身又增加了 3000 多亿。所以结论就很清楚,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是导致教育乱收费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找到这个根本原因,同时加大对现有教育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我们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三、教育公平问题

所谓教育公平，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三个方面，只有做到了上述公平，才能有教育结果的公平。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的公平相对容易做到，但教育质量的公平，即让人人受到较高质量的教育，并使受教育者有同样成功的机会，则较难做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6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子在入学、升学、就业、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但是现在很多单位、企业在招聘人员时，照样排斥女性；很多地方依然有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区别；中西部某些贫困地区青少年学生的辍学率依然很高，达到20%，个别地方达到30%以上。剥夺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的平等权利，实际上是教育领域不公平的一种表现。

概括地说，教育不公平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不公平，城市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农村的教育水平相对越来越低，很多农村学校不仅缺乏基本的教学材料，而且缺乏师资和设备；第二，区域教育之间的不公平。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教育的不公平，目前东部某些地区和大城市的教育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西部贫困地区仍未完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第三，学校教育之间的不公平。如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不公平，重点学校一直是各级政府财政投入的重点，而非重点学校因政府不重视、投入少而无人问津，教育质量低下；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的不公平，普通学校的学生可以考大学，而职业学校则很少有人能考上大学；第四，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教育的不公平。如正常儿童与特殊儿童教育的不公平，正常儿童基本上实现了普及义务教育，而特殊儿童很多不能上学；女性教育与男性教育之间的不公平；穷学生与富学生教育之间的不公平，等等。

教育领域的不公平，原因很多。在笔者看来，其深层原因主要为：（1）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一些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产生与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有关，根本

原因在于政府未能明确意识到义务教育不是非公共产品，也不是半（准）公共产品，而是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全部承担，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不应让老百姓分担其成本。政府未能尽到应有的职责，让老百姓买了不应该买的单；（2）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很低。近年来经过努力，虽有较大改观，但情况仍不乐观。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着教育的发展，进而阻碍着实现教育公平的历史进程；（3）精英教育的影响。精英教育论者认为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突出重点，确保重点，主张将有限的教育资源用于少数的重点院校和少数的精英人物，而对于大多数的一般院校和普通学生却关心甚少。这样，一般院校的教育资源很少，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多，受教育的程度不高；（4）社会的不公平。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处于发育阶段，市场经济的不规范拉开了人们收入的差距，不仅是绝对差距，而且相对差距也在拉大。这些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社会不公，也带来了教育的不公平。同时是社会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差距明显加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地方农民的收入越来越低，导致他们无法承担子女最基本的教育费用，不得不迫使子女辍学；（5）扭曲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在转型时期面临着传统的平均主义与现代竞争中优胜劣汰思想观念的双重障碍。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就要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则，讲究效率，进而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有些人则认为，计划经济就要平均主义式的公平，进而将公平与平均等同起来。两种扭曲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追求新的教育公平。

如何才能实现教育公平呢？

第一，政府应树立“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是政府应该做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半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这都是应该完全由（如前者）或大半由（如后者）政府所提供的。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受益者虽然主要是个人，但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实现教育公平，政府是天生的“第一责任人”。谁也不能代替政府，谁也代替不了政府。

第二，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没有较大的教育投入，教育改革和发展很难进行，教育公平也无法实现。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的教育投入一直严重不足。目前中央要下大决心压缩其他开支，确保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在这方面，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要与教育部等相关部门进一步统筹规划，通盘考虑。同时，各地方政府也要严格按照《教育法》第55条的规定要求，做到教育投入的“三个增长”。中央没做到的，中央负责，地方没做到的，地方负责。层层抓落实，一级管一级，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

第三，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国家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城乡贫困家庭子女、残疾儿童等就学的资助体系，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世界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强调，坚持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是正义的必然要求，平等是正义的第一位的因素，而合理的差异亦是正义的重要构成。但这里的差异应该是由强向弱的倾斜。然而，由于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长期实行的城市偏向政策，当今教育资源多向发达地区、大城市倾斜，这就违背了体现正义的合理差异原则。按照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应该是由城市向农村倾斜、由东部向西部倾斜、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倾斜、由富裕人群向贫困人口倾斜，这样才能体现公平正义。因此，在投入导向上，教育资源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应向处于弱势的地区和人群倾斜，特别是向农村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倾斜，向城乡贫困家庭子女倾斜，向残疾儿童倾斜，保证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子女和残疾儿童的基本的受义务教育权利。

第四，政府应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确保教育公平的实现。首先，教育部门要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分配教育资源时要遵循平等的原则、对等的原则和补差的原则。改变以往教育资源过于集中投向少数重点中小学和大学的局面。应该努力做到“两个确保”，即确保任何时候国家对于义务教育的投入都要高于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确保任何时候国家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都要高于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次，对政府投入较多的重点中小学和大学，要加强财务监管和评估，以防止教育资源浪费。再次，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民

办教育的发展。对民办学校一视同仁，给予资金、政策的支持。如政府的教育资金不足，应出台新的鼓励性政策，鼓励企业、私人投资教育，以解决目前教育供求紧张的矛盾。

第五，要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大力改革现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和劳动用人等制度，以制度创新促成教育公平。合理的制度可以促成教育公平，不合理的制度将会加大教育的不公平。

第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教育立法，以法律来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要尽快修订、完善《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等，还应考虑制定《农村教育法》、《教育投入法》、《学前教育法》、《高中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终身教育法》等，建立健全教育法规体系。

四、义务教育全免费问题

所谓义务教育全免费，是指免学费、杂费、教科书费，有条件的地方可提供伙食补助费（简称“三免一补”）。我们现在没有免的是教科书费，以及对于贫困生补助伙食费。这个跟我们国家讲的“两免一补”政策还有所不同。所谓“两免一补”政策是指对特定的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贫困家庭的学生实行免杂费、教科书费及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它有特定对象，从整个投入而言是比较小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范围上来说，义务教育全免费就更大，项目也更多，受益的人群也更广。而且笔者不仅主张普及到整个老百姓，更重要的是主张在“十一五”期间实施。最迟到 2010 年可以启动义务教育全免费。教育部在 2006 年 11 月 10 号正式宣布，按照教育部的规划，2007 年以前，实施 592 个国家及贫困县的“两免一补”。2010 年，对整个农村地区实行义务教育的免学费、免杂费。2015 年对整个城市，包括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免学费、杂费。笔者的提法是在时间上提前了五年，而且对象上又扩大到整个群体，项目上又由免学费、杂费，扩大到教科书费。

为什么说义务教育应该免费呢？从 1986 年中国正式颁布义务教育法起，政府部门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已近 20 年。20 年来，中国

农村义务教育虽取得了重大成绩，但问题也不少，其中之一就是没有真正实施全免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典型的纯公共产品，是每个社会成员均须接受的基本教育，是国家的责任，教育经费必须由国家承担，政府提供。公民有义务把学龄子女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政府更有义务担负义务教育所需的全部费用。

从国际上看，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全球 190 多个国家中有 170 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 GDP 只有中国 1/3 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

尽快实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体现。而且，如果我国的义务教育在未来几年内不能尽快实行全免费，那么，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尊师重教的传统以及正在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不相称的。因此，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大势所趋的情形下，我们希望中央的步子能够更快一些。但问题在于，提前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的时机成熟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实施义务教育全免费的单到底有多大，二是怎样落实和实施。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政府财力有限拿不出那么多钱”，这成了推行全部免费义务教育的一个阻碍。笔者经过仔细地推算认为，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强，我国提前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即在 2007 年农村普遍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2010 年全国普遍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已具备充分的条件和基础。关键不在财力，而在于政府的认识和决断。

那么，如果全国普遍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政府又需要拿出多少钱呢？按照 2006 年 1 月 25 日国家统计局刚调整过的 9.9% 的同比增长率计算，2005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约为 182321 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 14024 元。2005 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合计约 17316 万人，小学在校生约为 10846 万人，初中在校生约为 6470 万人。如按近年来我国各省实施“两免一补”经费数的平均数计算，小学每年每生需 300 元，初中每年每生需 500 元，两者合计约为 648.9 亿元。如保守地以 2004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79% 为基数计算，2005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应该在 5087 亿元左右，用于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只占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的 12.75% 左右；如按政府 1993 年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所承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 计算，全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该是 7292.8 亿元左右，用于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只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的 8.9% 左右。

笔者对整个“十一五”期间每年用于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总数和用于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比都做了一个估算，估算结果显示出两个规律，一是伴随着 2006 年到 201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头数的逐年自然递减、国民生产总值的逐年增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的逐年增加，用于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将越来越少，2006 年约为 634.3 亿，2007 年约为 620 亿，2008 年约为 605.38 亿，2009 年约为 590.88 亿，2010 年约为 576.3 亿；二是用于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率在逐年下降。如保守的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79%（2004 年数）计算，2006 年将降到 11.44%，2007 年将降到 10.36% 左右，2008 年将降到 9.36% 左右，2009 年将降到 8.46% 左右，2010 年将降到 7.64% 左右；如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 计算，2006 年将降到 8% 左右，2007 年将降到 7.22% 左右，2008 年将降到 6.53% 左右，2009 年将降到 5.9% 左右，2010 年将降到 5.33% 左右。即使按 2006 年最高的 634.3 亿算，以国家现有的财力承受下来也毫无问题。

若按较高的标准——人均 GDP 与生均财政经费比例的国际平均数算，小学每年每生需 500 元，初中每年每生需 1000 元，2010 年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在校生为 8846 万人，初中在校生约为 6220 万人，两者合计约为 1064 亿元。如保守的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79%（2004 年数）计算，2010 年全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该在 7536 亿元左右，用于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只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的 14.11% 左右；如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 计算，全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该在 10804.87 亿元左右，用于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只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的 9.84% 左右。

由此可见，不管哪种算法，实行全免费义务教育所需的经费并不多，国家的现有财力完全可以承受。而且国家已决定将高等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支出占教育总

经费的比例到 2010 年控制在 40% 之内，在实施方式上也可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不至于完全由一方负担而难施行。因此，随着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的逐年减少、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的逐年增加，到 2007 年左右完全有条件在农村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到 2010 年左右完全有条件实施包括城市在内的全国范围内的免费义务教育制度。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都具有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十一五”期间完全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国家教育经费承担的主体，实际上是分两大块。一是中央政府，一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里面实际上也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省级政府；第二个层次是市级政府或者是地区；第三是县区；第四是乡镇。但是我们知道，税费改革之后，乡镇由于它自身的困难，已经不能再承担这个任务了。所以，一般来说，应把国家教育经费承担的主体放到县级以上。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究竟中央政府出多少，然后省级政府里面由哪一级政府承担，是省级还是市级承担，要明确这个责任。

中央和地方怎么分担，笔者认为还是按照“分类承担”的原则，即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合理划分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具体而言，就是对现有的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应由中央政府拿钱全部承担；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不包括国家级贫困县）则建立由“中央和省共同负责，以中央为主”的教育财政投资体制。对于中部地区，实行以“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以地方为主”的教育财政投资体制。对于发达地区，则实行“以省市为主、中央适当补助”的教育财政投资体制。还可以考虑根据各地人均 GDP 水平或实际收入水平，对现有的不发达的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义务教育，即处于人均 GDP 水平或实际收入水平之下的，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拨款为辅来解决；对较发达的地区，即处于人均 GDP 水平或实际收入水平中线左右的，以地方政府为主、中央政府为辅拨款来解决；对发达的地区，即处于人均 GDP 水平或实际收入水平之上的像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完全应由地方政府自己解决，因为当地政府有这个能力。

我国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需要几个阶段的过渡，即免学费——免杂费——

免教科书费、补助贫困生伙食费，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全免费。从义务教育全免费的角度看，目前还只是走出了第一步，当然是非常可喜的第一步。中国的义务教育全免费很可能分三步走：第一步，从2005年起对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行免费；第二步，到2007年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普遍实行免费；第三步，在此基础上逐步对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家庭学生实行免费。如果再具体一点，也可说分四步走：农村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家庭—农村的全部贫困家庭—农村所有家庭—城市所有家庭。在学段上，鉴于我国还有不少地区学生仅能接受小学阶段义务教育的现实，义务教育全免费的实施可先从小学阶段做起，再逐步推行到初中阶段，最终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

笔者所主张的义务教育全免费，是指除免学费、杂费外，再加上免教科书费。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实施义务教育全免费，且效果显著。日本在战败后经济受重创的情况下，仍于1947年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从1963年起，开始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全体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美国的大多数州一直到对高中生都免费提供教科书。

为什么要免教科书费呢？首先，义务教育是一项典型的纯公共产品，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是政府的职责，政府理应担负这项责任。其次，有利于进一步减轻人民的负担，确保贫困家庭子女上得起学。第三，继续征收教科书费会给教育乱收费预留口子，难以真正有效地遏止教育乱收费。第四，不利于加强师德建设，影响教师的社会形象，败坏社会风气。

那么，免教科书的数额到底有多大，政府目前能否承担得起呢？且以湖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用作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的平均值来计算。湖北地处我国中部地区，比较具有代表性，其平均值兼顾了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两方面的情况。据悉，湖北省2005年“两免一补”中免教材费的标准为：小学生每学年70元，初中生每学年140元（中部的安徽等省也大致如此）。依此标准计算，全国小学生、初中生每年教科书的总数按2005年小学在校生为10846万人，初中在校生约为6470万人计算，全国小学生约需要75.92亿元，初中生约需要90.58亿元，两者之和约为166.5亿元。按新调整的200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79%计算，这笔费用仅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4466亿的3.72%左右。

随着未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加大，特别是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的逐年减少，这笔费用总数还将逐步减少，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比例还将逐步下降。况且，如果教科书由国家免费提供，可以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实行教材循环使用制度。目前义务教育在校中小学生 1.7316 亿元，按上述免教材费标准计算，全国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约为 166.5 亿元，若每本教科书能转继续使用 5 年，则国家每年实际负担的教科书费约为 33.3 亿元。可见，国家财政是完全负担得起的。即使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问题也不太大，何况还可考虑由中央与地方实行成本分担，减轻双方的压力。



ChatGPT 对教育生态的冲击及应对策略

来源 |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04期

ChatGPT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是 2022 年 11 月 30 日由美国 OpenAI 公司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本质上, ChatGPT 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LLM), 采用“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 对人类的文字语言和自然语言进行理解和处理, 具有较强的内容生成能力。ChatGPT 可对输入的各类问题进行回复, 能够与用户进行多轮对话并协助人类完成一系列任务。换言之, ChatGPT 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简单的聊天, 还可以做作业、写论文、翻译、创作诗歌, 甚至编写代码、检查程序错误, 等等。瑞银的研究报告显示, ChatGPT 在推出后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吸引活跃用户约 1.23 亿, 成为史上用户增速最快的应用程序。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认为, ChatGPT 将“改变世界”; 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 ChatGPT “本质上就是高科技剽窃”和“避免学习的一种方式”。ChatGPT 在全球范围内的爆火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与此同时, 由于 ChatGPT 具有强大的解题能力和写作功能, 随即成为教育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杰里米·韦斯曼(Jeremy Weissman)指出, “ChatGPT 是对教育的一场瘟疫”。作为教育工作者, 有必要对这一现象级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介入教育生态作出冷静思考与探究, 以期充分发挥 ChatGPT 等数字技术的优势并将其给教育带来的负向效应降到最低。

一、禁止或拥抱: ChatGPT 再掀人工智能教育浪潮

教育界、学术界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 有学者从批判传统教育不足的角度出发, 指出“未来的人工智能会让我们的教育制度下培养学生的优势荡然无存”。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与发展, 人们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心与日俱增,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引领和助推教育转型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与此同时, 随着 ChatGPT 的现象级走红, 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 人类社会似乎到了一个接近技术奇点的时刻, 教育工作者对此喜忧参半。

从全球范围看，在 ChatGPT 对教育生态的首波冲击下，人们对其关注的首要方面是全面禁止还是热情拥抱？当前，部分观点对 ChatGPT 持谨慎态度，已经有学校出于担心 ChatGPT 的使用可能变得不可控制，出台一系列对其完全禁止或严格限制使用的措施。例如，出于对学习负面影响以及准确性的担忧，美国纽约市教育部门于 2023 年 1 月宣布，禁止全市师生在学校的网络和设备上使用 ChatGPT，西雅图的部分公立学校同样如此。在欧洲，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出台相关举措，明确学术领域严禁在没有透明引用的情况下使用 ChatGPT 或任何其他 AI 工具。印度班加罗尔 RV 大学发布 ChatGPT 禁令，严格禁止学生使用 ChatGPT 进行作业、考试和实验室测试等学术活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塔斯马尼亚州及西澳大利亚州等相继出台类似措施，禁止在校内使用 ChatGPT。我国香港大学宣布禁止在课堂、作业和考试中使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工具，除非学生事先获得授课教师的书面同意，否则将被视为剽窃。事实上，在 ChatGPT 爆火之前，出于对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和伦理风险等方面的考虑，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均高度关注这一领域的风险挑战，相继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尝试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等进行规制，但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

在教育领域全面“封杀”ChatGPT 尚未成为共识，有专家和学者对 ChatGPT 给教育带来的革新持乐观态度。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巴斯卡尔·维拉（Bhaskar Vira）教授认为，大学禁止使用诸如 ChatGPT 的人工智能应用并不明智，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可用的新工具；应对教学过程、考试规范作出相应调整，以确保学生在使用 ChatGPT 的同时坚守学术诚信。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翰·维沃瑟诺（John Villasenor）教授认为，与其禁止学生使用省时省力的人工智能写作工具，不如教会学生用合乎道德且高效的方式进行使用。他允许他的学生在作业中使用 ChatGPT。发表于《自然》杂志的《ChatGPT 用于研究的五个重点问题》一文阐述了“拥抱人工智能的好处”。该文指出，ChatGPT 可以帮助研究者节约时间，让学者腾出手专注于新的实验。这样不仅可以加快创新，而且可能会在许多学科诞生新的突破。只要解决目前的偏见问题、出处问题和不准确等问题，ChatGPT 将会拥有巨大潜力。

面对 ChatGPT，教育界已无法置身事外。诚然，在尚未掌握 ChatGPT 介入教育生态的普遍规律之前，应保持小心谨慎。但当前的关注点不应只停留在拥抱还是禁止层面的讨论，单纯的遏制难以产生实际效果，相反，极度的技术狂欢会转而陷入数字化“漩涡”。全面思考如何应对 ChatGPT 给教育带来的冲击才是重中之重。应未雨绸缪、长虑却顾，尽可能全面地厘清 ChatGPT 给教育带来的变化，认真思考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潜在风险，进一步探索如何重构教育生态，以有效应对新技术对教育带来的冲击，更好地实现教育“适应”与“超越”的重大使命。

二、审视与探赜：ChatGPT 介入教育生态

大型语言模型并非神秘莫测，在 ChatGPT 横空出世之前已出现相关技术，但 ChatGPT 的爆火无疑让这一项人工智能技术切实走进大众的生活世界。如果渐进性技术创新是对当前已有技术作增量式改进工作，那么，颠覆性技术创新是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进行，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取代现有的主流技术。或许 ChatGPT 本身蕴含巨大的变革教育的潜能，也可能孕育一种颠覆性技术创新，但就目前而言，人们尚未找到将其潜力全部转化为现实的最佳路径。数字技术会将教育带往何处，是需要教育界、学术界持续深入探索的课题。当下首先要做的是尽可能全面洞悉 ChatGPT 可能对教育生态产生何种影响。

（一）自主学习迎来新定义

自主学习指学习者独立完成某项活动或任务。学习者能够根据自身已有知识，结合自身学习能力和动机，主动调整学习策略，独立完成学习。自主学习的实质是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呼吁以学习为中心，如果使用得当，ChatGPT 或将加速学习中心的转向。

ChatGPT 可以向学习者提供个性化指导和交互式帮助，为学习者自主学习提供有利条件。具言之，一是提供个性化支持。ChatGPT 可以根据每位学习者提出的不同问题进行针对性回答，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帮助。在无法当面获取教师帮助之时，这样的帮助显得尤为可贵。二是给予实时反馈和指导。学习者在主动

获取学习资源时，ChatGPT 可以对学习者提出的各种问题给予及时反馈。三是互动学习。ChatGPT 可以用于创建互动学习体验，即学习者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与虚拟教师进行互动。四是方便灵活的学习。与聊天机器人交谈可以不分时间和地点，学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条件使用 ChatGPT 进行学习。五是自我反思和评价。学习者可以使用 ChatGPT 反思自己的学习和进步，找出可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部分。六是推荐书籍和阅读材料。ChatGPT 可以根据学生的阅读水平、阅读兴趣和阅读记录等，为学生推荐适合的书籍和其他材料。七是帮助完成写作任务。ChatGPT 可以帮助学生产生想法、撰写大纲和校对文稿。八是提供语言学习帮助。ChatGPT 不仅可以将学习材料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检查写作中的语法错误，并给出正确的用法建议。

但必须指出的是，ChatGPT 生成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如若学生分辨能力有限，将会习得错误知识而不自知。此外，由于 ChatGPT 可以充当百科全书式的私人学习顾问，学生可能转而将信任交由技术，甚至出现拒绝与现实中的教师和同学合作，导致师生交往受阻、生生交往有碍。由此可见，ChatGPT 在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的同时，有可能将学习的主体囚禁在各自的“孤岛”。

（二）教师教学迎来新变革

虽然目前没有任何技术能够替代或消除人们对优秀的人类教师的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 ChatGPT 的爆火，教师教学迎来了诸多变化。在提升教学效率方面，ChatGPT 具有一定的天然优势。在课前，ChatGPT 可以协助教师备课。其一，设计大纲。ChatGPT 可以为教师的课程设计提供思路，帮助教师设计教学大纲和课程计划，等等。其二，陈列知识点。通过问答式搜索，ChatGPT 可以帮助教师迅速罗列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其三，丰富教学内容。通过多轮互动，ChatGPT 可以帮助教师不断完善相关教学内容。其四，模拟课堂。通过与 ChatGPT 进行模拟对话，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困惑，并为课堂讲授做好相应准备。其五，语言翻译。如果教师需要在课堂上使用其他语言，可以利用 ChatGPT 进行翻译。在课堂中，ChatGPT 也可以充当人工智能助教的角色，为师生提供一个即时反馈平台，实时回答师生提出的问题，增加课堂生动性、趣味性和吸引力，有助于学生对复

杂内容和概念的理解。在课后，ChatGPT 可以参与作业评价。ChatGPT 能够生成作业题目和考试试题，帮助教师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此外，ChatGPT 还可以协助教师完成其他日常工作，例如，拟写会议邀请函，撰写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汇报，等等。

教师较学生具有更强的对错分辨能力，可以在使用 ChatGPT 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倘若使用得当，ChatGPT 有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帮助教师提升教学效率，让教师有更多时间改进教学。但也应明确，无论是 ChatGPT，还是其他人工智能技术，都无法提供与真正教师相同水平的人际互动。

（三）学校课程迎来新挑战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能否适应时代需要构建相应的课程体系直接关系到人才的培养质量。课程具有与时偕行、不断发展的动态特性。一方面，传承人类社会日积月累积淀的优秀经验；另一方面，汇聚时代赋予的必要知识与技能。ChatGPT 介入教育生态后，必须思考当下的课程体系能否满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需要？还要思考是否有必要将 ChatGPT 的正确使用纳入当前的课程体系？当前，学生应该学习哪些内容才能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2030 学习罗盘》（Learning Compass 2030）指出，在数字化时代，数字素养正变得与学生的身体健康及心理幸福一样重要。世界经济论坛建构的“教育 4.0 全球框架”强调，技术技能是未来教育必须聚焦培养的核心技能。ChatGPT 对教育生态的介入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技术变革对学校课程提出的挑战——课程体系必须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技能。在课程目标设置上，更加重视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和优秀学习品质的培育；在课程内容设置上，立足知识学习并超越知识学习；在课程实施上，利用好人工智能技术；在课程评价上，兼顾学生的数字素养。

（四）人才培养标准迎来新转向

随着 ChatGPT 等新技术的兴起，传统的评价方式受到冲击，传统的人才观

加速改变，迫切要求重新定义人才培养标准。ChatGPT 可以轻松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类知识性问题，与传统的搜索引擎相比，准确性也有较大提高。有研究表明，ChatGPT 能够帮助研究人员撰写一篇连贯准确、信息丰富、系统完整的论文，而且写作效率极高。这让人类意识到，数字技术拥有人类所有知识的总和只是时间问题。有学者直言，诸如 ChatGPT 的机器人为传统形式的教育评估敲响了丧钟。教育者亟需全面反思，对教学评估方式作出实质性、创新性改变。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ChatGPT 能够展示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以最少的输入生成高度真实的文本。在数字化时代，如果培养的个体仅仅是低端的脑力劳动者，那么，未来他们很容易被新技术取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指出，教育要“为一个新世界培养新人”，这一论述在当前仍合时宜。数字化时代的人才培养不应局限于知识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能够适应数字化时代的个体，培养人工智能技术的驾驭者。显然，伴随 ChatGPT 介入教育生态，人才的培养目标正加速由传统的知识型人才向复合型人才和应用创新型人才转变。

三、反思与规避：ChatGPT 介入教育生态的潜在风险

毫无疑问，ChatGPT 绝非神谕通天、无所不能，它具有四方面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其一，ChatGPT 生成的结果来自其训练数据中的统计规律，而非类似人类对复杂世界和抽象系统的理解，因此，其理解能力有限，有可能产生不正确信息。其二，ChatGPT 高度依赖其训练的数据。如果训练数据不充分或者不相关，生成的结果就会不尽如人意。如果训练的数据包含偏见，生成的结果也可能包含偏见。其三，当前版本的 ChatGPT 因为其训练数据截至 2021 年年底，对 2021 年之后的世界知识不了解。其四，由于 ChatGPT 的训练数据多为英文语料，因此，在语言使用上，英文表现最佳，其他语种语意理解能力略逊一筹。聚焦教育领域，当 ChatGPT 介入教育生态后，教育在享受技术变革带来红利的同时，人工智能自带的风险也乘势进入。2021 年 11 月 1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指出数字技术背后存在多重逻辑，

其中，部分具有巨大的解放潜力，而另一部分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风险。ChatGPT作为一种尚未完全成熟的技术，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人与社会的同时，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

（一）知识异化风险

ChatGPT 引发的知识变革可能会在某种程度加剧知识异化，主要风险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知识的真实性难以分辨。 ChatGPT 生成回答的过程类似某种“技术黑箱”，具有不透明性和不可解释性。换言之，人们只知道 ChatGPT 给出的某种确定回答，但对其思考过程、运作过程、获取过程一无所知，甚至无法作出解释。这是因为人工智能研发者设计了某个算法模型，但不会决定某个参数的具体权重，也不会告知某个结果何以得出。

第二，知识的权威性难以保证。 ChatGPT 更擅长回答文科问题，例如，生成作文素材、描述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等等。在回答理科问题时正确率难以保证，尤其是需要严密逻辑推理的问题。此外，对于部分个性化较强的中文问题，ChatGPT 有时无法给出准确回答。从短期看，这些错误信息会对学生的学习造成干扰，与课堂上教师教授的知识相矛盾，影响知识的权威性。从长期看，如不完善相应技术，ChatGPT 可能导致虚假知识泛滥，知识界将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

第三，加剧知识碎片化现象。 知识碎片化指知识处于一种被不断切割的状态，知识粒度越来越细、知识细节越来越详尽、知识表征形式越来越丰富。ChatGPT 对学习者问题的回答大多是专题性质的，即问什么回答什么，虽然细致入微，但难以保证知识的全面性与系统性。不可否认，知识的碎片化更适应数字时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将原本结构化、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解构得支离破碎。面对杂乱无章的知识碎片，学生难以建构起知识间的关联，进而将其还原为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

第四，ChatGPT 可能会导致普遍性知识的瓦解，甚至危及人们对知识的信仰。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日益表现出较人类更优越的分析效率，在普遍性知识获取层面，ChatGPT 拥有人类无法比拟的优势。当人们被高精确性的数字技术“俘获”后，技术主义浮出水面，极易使人丧失理性、放弃智识，人们变得唯技术是从，“读书无用论”可能甚嚣尘上。

（二）学生主体性异化风险

当人工智能技术对包括生物人脑在内的众多领域呈现超越态势时，技术的逻辑有可能偏离原有的轨道，甚至会挣脱主体的控制，对个体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方面展开攻击。ChatGPT 对学生的影响也如此，若规范不当，极有可能导致学生主体性异化。

第一，ChatGPT 的发展可能导致身体隐退。“科学技术正侵蚀着公认的有界、自我决定和至高无上的‘人’的范畴，并为人类提供一种假肢性的存在，一种‘赛博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永远都处于（去）建构之中。”从短期看，学生沉迷数字世界可能诱发近视、颈椎病、干眼症、肌腱炎等“电子病”。从长期看，学生的身体可能被技术控制和支配，进而沦为“驯服的身体”。届时，完整且纯粹意义上的身体将不复存在。

第二，ChatGPT 的精准回答容易消弭学生的自主能动性，使学生沦为技术的奴隶。ChatGPT 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帮助的同时，也剥夺了学生自主探索与选择的权利，选择权的悬置进一步削弱学生学习的自主能动性。随着技术的发展，智能算法可以实现更精准的投喂，容易导致智识上的懒惰。安东尼·奥曼（Antony Aumann）教授在批改课程论文时，读到了他认为的“班级最好的论文”。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出自 ChatGPT。如果教师不能发现学生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完成作业，那么，学生有可能陷入 ChatGPT 营造的“安乐窝”而不可自拔。

第三，倘若学生对 ChatGPT 过度迷恋，极易导致学生创造性的隐退与遮蔽。根据在线课程供应商 Study.com 的一项调查显示，89% 的美国大学生承认使用 ChatGPT 完成家庭作业，约 48% 的学生承认利用 ChatGPT 完成家庭测试，超过 50% 的学生使用 ChatGPT 写论文，22% 的学生承认曾向 ChatGPT 获取论文写作大

纲。由此可见，ChatGPT 容易成为学生应付作业或考试作弊的工具，这也成为美国纽约教育部门禁止 ChatGPT 的原因。虽然 ChatGPT 能够为学生提供即时且内容丰富的学习材料，但并不利于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述能力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才成功至关重要。长此以往，学生极易形成一种“只用眼睛，不用头脑”的学习习惯，最终沦为 ChatGPT 的“持存物”。

（三）教学过程异化风险

人是有思想的鲜活生命体。教学过程并非单纯的认知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对生命意义的创造与提升。换言之，教学过程是主体对生命意义的建构过程和体验过程。将 ChatGPT 引入教育领域的根本目的是优化教学，促进个体全面发展。但是稍有不慎，不仅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而且将导致教学过程异化。

第一，教学可能异化为单向度的知识传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用 ChatGPT 传授知识变得更容易。约翰·杜威（John Dewey）指出，“学习中求知知识的真正目的，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学得制造知识以应需求的方法”。显然，相较于知识习得的结果而言，习得知识的过程更重要。在只有知识教授而缺乏全面引导的情况下，“教育就变成训练机器人，而人也变成单功能的计算之人，在仅仅维持生命力的状况中可能会萎缩而无法看见超越之境”。第二，教学过程固定化风险。教师在利用 ChatGPT 进行课程设计和辅助备课时，由于 ChatGPT 会给出具体的教学计划、教学材料等，容易使教师在课堂上教授的内容变得绝对化和凝固化，教师会按照 ChatGPT 给出的教学计划执行教学。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体性衰微的教师沦为 ChatGPT 的“代言人”，教学过程异化为一种照本宣科的、固定的讲授过程，缺乏教学应有的生成性和体验性。由此可知，教学过程不可完全预设，课堂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而教师具备的教学机智与教学艺术这些具有教学的魅力表现方式将逐渐衰弱。

第三，师生交往异化风险。教学过程蕴含丰富多彩的师生互动交往。但是，在高度发达的技术世界中，人的情感、特性、价值、多样性逐渐被消解，沦为庞大机器体系中的零件，使主体变为抽象的数字和符号，等等。当 ChatGPT 被赋予权利、替代教师执行部分教学任务时，现实中的师生交往被异化为符号与符号之

间的交往，技术理性排斥情感因素，师生情感互动和情感生成受阻，原本灵魂与灵魂的碰撞、情感与情感的交流难以实现。

（四）数字伦理风险

ChatGPT 崛起而起，需要认真思考其背后可能产生的数字伦理问题。

第一，数据泄露风险。教师和学生向 ChatGPT 提问时，会产生大量教育数据。收集教育数据的最初目的是服务师生，难免涉及个人信息、课程内容、教学过程，等等。一旦发生数据泄露，不仅给教师和学生带来麻烦和困扰，而且会波及更多的人群和领域，极易衍生电信网络诈骗等案件，甚至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教育数据采集、存储、分析、使用和共享中每一环节的隐私安全都不容忽视。

第二，部分教师失业风险。有观点认为，ChatGPT 在教育领域的使用可能导致部分人类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教育专业人员被取代，加剧社会失业问题，给失业者个人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同时，给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隐患。

第三，ChatGPT 可能会产生具有攻击性或有偏见的内容。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地域歧视和年龄歧视等不当言论可能隐含在其训练的数据中，一定情况下会被 ChatGPT 误用进而生成不当信息。例如，某些人可能会想方设法规避 ChatGPT 的限制。如果直接问 ChatGPT 是否具有种族主义，它将拒绝回答这一问题。但如果要求它设计一个程序，该程序要根据一个人的个人信息和人口统计信息决定是否接受其求职申请，那么，ChatGPT 可能会表现出种族主义倾向。由此可见，ChatGPT 可能会成为别有用心者散布有害信息的工具，用以传播仇恨言论、有害信息、制造人身攻击，等等。

第四，学术论文发表中的伦理风险。ChatGPT 可依据海量语料数据库，独立完成或辅助学者完成论文撰写任务。但它使用的语料数据库是否存在对原创知识的亵渎或剽窃？当 ChatGPT 参与学术论文写作时，如何判断学者的独立性和工作量？在研究中，ChatGPT 是作为研究工具，还是作为合作伙伴？ChatGPT 的应用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学术不端行为，助长学术造假风气？正是出于对伦理风险和法律风险的考量，学术期刊对此相继作出规定。例如，《科学》杂志明确规

定由 ChatGPT 或其他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文本不能在论文中使用，而且严禁将 ChatGPT 列为合著者。在我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暂不接受任何大型语言模型工具（例如，ChatGPT）单独或联合署名的文章。《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也发布声明，建议作者在参考文献、致谢等文字中对使用人工智能写作工具（例如，ChatGPT，等等）的情况予以说明。

（五）数字教育治理风险

ChatGPT 的爆火加速了人们对传统教育治理向数字教育治理转变的思考。鉴于当前数字教育治理体系尚不完善，还需全面考量 ChatGPT 可能带来的数字教育治理风险。

第一，ChatGPT 作为国外技术，潜藏着跨国治理难题。使用 ChatGPT 必然会产生数据跨境流动，用户的教育数据极有可能被隐藏的私营人工智能运营商挖掘和操控。必须警惕的是，一旦数字私有治理体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占据人工智能治理霸权地位，必然会削弱其他主权国家公共治理体对人工智能治理问题的管理能力。

第二，对于用户使用 ChatGPT 的权责界定目前仍模糊不清。毋庸讳言，现行法律规定和法律执行远远滞后于 ChatGPT 的迭代创新和渗透速度。虽然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逐渐走向成熟，但与之相配套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形成。要认真思考当前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是否足以应对 ChatGPT 给教育带来的挑战。

第三，倘若治理不当，恐有教育数字鸿沟加剧之虞。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平，对教育公平的追求贯穿我国教育改革与实践始终。ChatGPT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既可能缩小教育差距，让偏远地区学子在数字化轨道上拥有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但也有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风险。这里的数字鸿沟不仅包括一国内部不同地域、地区之间的差距，而且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数字鸿沟。若 ChatGPT 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可能会进一步拉大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势必影响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

四、适应与超越：重塑数字化时代的教育生态

ChatGPT 能否被合理使用，并较好地融入教育，仍需要一定的时间探索与实践。不可回避的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数字世界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协同进化的时代，适应数字时代的变革已成为教育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要以 ChatGPT 介入教育生态的思考为契机，针对人工智能教育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提前进行干预和控制，确保教育新生态的良性循环。

（一）加强自主研发，完善顶层设计

全面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是在全球竞争中掌握数字主权的迫切需要。应充分发挥我国在数据和数字技术领域的比较优势，维护我国与整个国际社会的数据安全与数字利益。

第一，坚持自立自强，加强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加快推出中国版 ChatGPT。将人工智能教育完全依赖于国外科技发展，无异于“自断双臂”。目前，百度正在研发大模型类项目“文心一言”，京东宣布将推出产业版 ChatGPT，阿里、网易、360 等企业也纷纷表示正在研发类似产品。在 ChatGPT 席卷全球背景下，我国亟需进一步布局国际领先水平的算力基地建设，尤其在教育领域。要从教育自身出发，加快对 ChatGPT 同源技术（AI Generated Content，AIGC）在教育场景中的落地开发。

第二，不断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构建有效的数据管理机制。建立有效的数据管理机制是构建安全有效的数字化教育生态的前提。目前，我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旨在保障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在教育领域，2018 年 1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教育部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教育数据管理办法》。2021 年 4 月，教育部联合七部门下发《关于加强教育系统数据安全工作的通知》，强调“全面加强数据安全保护能力，提升数据安全合法合规管理水平，有力支撑教育事业发展”。必须指出的是，除一般性数据保护法规外，对人工智能应用在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领域中产生的伦理问题，目前世界各国基本处于立法空白和管

制失序状态。针对 ChatGPT 可能引发的伦理风险和数据安全问题，亟需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第三，构建以数据为核心的标准规范体系。标准化是衡量某一行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提升治理水平的坚实基础。国家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诸如 ChatGPT 等人工智能的算法描述信息、安全抽象框架和伦理审查等方面的标准研制，与时俱进地规范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对一般性人工智能应用而言，一是制定分类分级标准，落实数据分类管理与分类保护，为数据安全保护工作奠定良好基础。二是结合教育法律法规和教育行业规定，定期对教育数据进行安全风险评估。三是围绕数据处理活动的过程，对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等进行保护，进一步提升数据安全防护能力。此外，对诸如 ChatGPT 等国外技术而言，要进一步提升防入侵、防泄露、防窃取等整体防御水平和能力。

（二）辨明技术本质，回归育人本位

技术是把“双刃剑”。技术本身不存在理念，既没有圆满理念，也没有毁灭理念。这两种理念的产生都有其他源头，这些源头均来自人类，是人赋予技术以意义。数字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人类使用数字技术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教育。若任其自由无序发展，技术也可能变为限制、反对人类的力量。因此，必须加强对包括 ChatGPT 在内的人工智能的管控。

传统的把教育等同于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知识传授的教育方法已穷途末路。对 ChatGPT 而言，传授固定知识易如拾芥，甚至可以比教师做得更好。未来，教师的工作重心将彻底转向育人。只有从技术取向回归育人取向，才能在技术与生命的双向耦合中培育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

回归育人本位，教师要承担好双重使命：一是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塑造。在高度智能化的环境中，学生极易被技术误导。情感是建构人生的基础性素质，也是区别于其他非生命个体的重要标志，影响人生在世的一切“作为”。冰冷的机器无法给予学生细致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爱，师生生命交互的关键在于情感的碰撞。教师要把更多精力聚焦在和学生灵魂的沟通上，常怀仁爱之心，不断加强

情感的交流和生命的对话，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帮助学生永葆正确价值观；二是关注学生高阶能力的培养。在数字化时代，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唤醒，是培养具有高阶思维能力、综合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人，不再是培养获取特定知识的人。必须更加重视对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只有人类才具有的能力的培养，例如，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同理心、好奇心，等等。

必须看到，在数字化时代，教育内容正在被重构，德智体美劳被赋予新的内涵。要关注学生传统美德的培养，还要增强学生的数字伦理意识；要让学生掌握知识，还要让学生掌握数字技能；要让学生拥有拥抱数字世界的自由，还要保证现实体育锻炼的时间和空间；要让学生在现实中发现美和感受美，还要让学生在数字世界中欣赏美和创造美；要让学生参与具身性劳动，还要培养数字劳动意识和劳动素养。

教育是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复杂系统，无论数字化时代的教育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都必须坚守育人初心和使命。要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培育。要以促进人的自由的、全面的、个性化的发展为根本目的，加强对 ChatGPT 等技术介入教育生态的规律总结，真正做到技术服务育人，技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提高师生数字素养，走向和合共生的人机交互

教育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时代已经到来，正确发挥 ChatGPT 等数字技术的优势，并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是人类必须面对的议题。ChatGPT 由人创造发明，究其本质，是人类改造社会的产物，客观而言，人类能够正确驾驭 ChatGPT，但亟需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以确保人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避免沦为其附庸。

在提高教师数字素养方面，第一，教师应当树立正确的技术使用观，明晰在教学中哪些地方使用 ChatGPT 可以优化教学，哪些地方要完全禁止使用 ChatGPT。换言之，在技术使用中，应秉持“当用则用，操纵适宜”的原则。第二，教师要提高数字意识。在某些方面，技术比人类教师更细腻、更准确，教师要在

合理使用 ChatGPT 等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差异化、精准化施教。第三，教师要增强数字胜任力。数字化时代的教师借助 ChatGPT 等数字化技术提升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是历史赋予的使命。第四，教师要提高终身学习能力。技术的发展使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只有不断学习，才不会被时代淘汰。

在提高学生数字素养方面，一是提升学生的自主可控意识。摒弃技术万能的观念，无论在何时何地使用 ChatGPT 等技术，都不能放弃个人的独立思考。二是鉴于 ChatGPT 回答的准确性尚不能保障，学生要不断提高信息筛选能力，尤其是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三是学生要不断提升数字技能。要在使用 ChatGPT 等数字技术的过程中锻炼实际能力，提高探索意识，激发创新热情。四是制定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将学生的数字素养纳入学生综合评价。需要指出的是，提高学生的数字素养，不能仅依靠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还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广泛支持与密切配合。

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日益融入人的生命肢体，甚至逐渐发展成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在师生数字化素养中，人机交互能力是最为重要的数字能力之一。要在发挥人类智能的同时，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的潜能，人机交互是关键。师生应在尊重技术的同时，积极推动技术朝着更符合发展需求的方向发展。对学生而言，要利用好技术支持，不断发扬自身特长，使 ChatGPT 等技术真正成为个体的“义肢”；对教师而言，要借助 ChatGPT 等技术不断探索未知世界，寻找新的发现。需要强调的是，不可盲目、过度依赖技术。人机交互不是让人变成 ChatGPT 等技术的随从，而是要在坚持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发挥技术的功能。

（四）坚守数字伦理，共筑美好未来

无论 ChatGPT，还是其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必须合理、合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完成的，并不等同于得到伦理和法律的许可。只有坚守数字伦理、加强协同治理，方能共筑美好未来。

2023年2月16日，一则“杭州将在3月1日取消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新闻在网上流传，随后这则“新闻”的来源被证实是杭州某小区业主在讨论 ChatGPT 时，

一位业主用 ChatGPT 写文稿，后经由其他业主截图转发，导致错误信息传播。这一案例提醒我们要关注 ChatGPT 背后的伦理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是要制定关于 ChatGPT 的一般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避免道德失范，推进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道德自律。从教育视角看，应在明晰数字伦理内涵外延的基础上，加强数字伦理培育。首先，加强数字伦理研究，对 ChatGPT 等新技术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侵害进行审慎预判。国家应尽快组建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委员会，邀请教育、科技、伦理、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展开论证及风险评估，确保技术更新迭代始终为人的教育服务。其次，将数字科技伦理教育纳入课程标准，加强对学生数字伦理意识与个人信息保护能力的培养。最后，在学校教育中加强数字伦理培育。学校应完善数字伦理教育体系，制定数字伦理教育规划及实施方案。将数字伦理素养的培育贯穿教学各环节各方面，努力将坚守数字伦理内化为师生的自觉行为与共同价值追求。

进言之，推动数字伦理建设，还需加强多主体间的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抵御 ChatGPT 潜藏的风险。首先，由政府 and 行业协会牵头，企业应尽快形成行业共识，出台诸如 ChatGPT 新技术的使用指引，提示伦理风险和法律风险，多措并举做好合规工作。其次，仅通过学校教育不足以让全部用户学会如何合乎道德地使用 ChatGPT 等新技术，还要通过媒体、企业等做好用户教育工作，让用户充分了解如何正确使用新技术新工具。再次，师生、学者、研发者和监管者中的任何一方在使用 ChatGPT 等新技术的同时，都要承担坚守数字伦理的义务。最后，加快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数字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全球数字治理难题提出的现代化理念，为解决全球数字治理难题和应对数字发展带来的伦理困境提供了科学的伦理价值引导。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为解决 ChatGPT 背后潜藏的跨国治理难题提供了可能性，在世界各方协同治理下，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治共赢。

五、结语

随着 ChatGPT 的爆火，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介入教育生态，并为当前的教育现代化带来巨大冲击。化冲击为契机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

学术工作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技术与教育并非对立关系，技术进步与教育发展能够也应该实现同频共振、和谐共鸣。ChatGPT 的诞生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里程碑，更是分水岭，它已成为教育改革的一次重大历史性机遇，尤其在重塑知识体系和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望通过改变底层知识逻辑进而“撬动”整个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甚至重塑教育生态体系。

身处时代洪流，要么主动选择，要么被动选择，谁都无法置身事外。面对新技术浪潮，与其奋力抵抗，不如化危为机，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实现人与智能的高效融合，利用技术助力教育发展。当然，必须始终牢记唯有让人本身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充分觉醒，激发创造性，未来人类才能不被自己所创造的技术掌控，进而在人类与技术的竞争中最终胜出，成为历史的主宰。



2024 桂林·长江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



2024年5月24日，2024桂林·长江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桂林市召开。论坛由长江教育研究院、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主办，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广西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承办。

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孙杰远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教育学一定能够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发挥更大作为，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并激励青年学者应该努力学习和汲取前辈们的智慧，勇担时代使命，推进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阐述了教育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新时代新征程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和关键任务，以及本次论坛主题的时代前沿性和长江教育研究院近年来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他希望通过本次论坛为我国教育现代化提供智慧和力量。

论坛上，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振国、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孙杰远、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柳海民、山西大学教授侯怀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马陆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高书国、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王栢、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申国昌、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杨小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程亮、宁波大学教授张宝歌、南宁师范大学教授王屹等，分别作了题为“高等教育强国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分析”、“关于教育强国内涵的思考”、“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演进”、“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创世方式与增值行动”、“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的探索”、“教育是‘硬’的软实力”、“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等教育现代化布局重构的价值指向与策略选择”、“中国教育现代化背景下教师的角色定位”、“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内涵、表征及实施路径”、“教育现代化的中国内涵与样态”、“面向教育现代化的中国教育学建设”、“教育强国视域下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逻辑”、“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使命宗旨、逻辑理路与行动路向”的主旨报告。

青年学者们主要围绕“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回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当下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未来展望”三大议题开展深入交流，热烈研讨了相关热点与难点问题。

论坛上，长江教育研究院和广西师范大学签订了西南教育智库协议。



2024 桂林·长江教育论坛

5月24日上午论坛实录

1. 大会开幕式暨签约仪式

2024年5月24日上午8时30分，2024桂林·长江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学术研讨会会议开幕式暨签约仪式在中国山水名城桂林市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去、当下及未来”。本次会议的主办方是长江教育研究院、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承办方是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广西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开幕式由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部长叶蓓蓓主持。



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教育学部部长孙杰远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孙校长代表广西师范大学全体师生，对与会的专家和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孙校长高度赞扬了长江教育研究院及其领导下的学术组织和机构在中国教育智库建设、国家教育治理、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等方面的贡献，认为他们的成果是中国教育变革和政策研究的重要推动力。孙校长回顾了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

的发展历程，强调广西师范大学愿意以谦虚、虔诚和进取的态度迎接挑战，继续推动教育学的发展。孙校长还强调了青年学者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希望青年学者能从前辈的学术成就中汲取力量，共同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作出贡献。最后，孙校长表达了对本次会议的美好祝愿，希望教育学科能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致辞。周院长指出教育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他引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规划，强调要找准教育现代化的定位，明确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方向，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教育强国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以教育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周院长还介绍了长江教育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在推动建设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智库过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指出研究院未来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各方合作，共促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最后，周院长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期待与会者深入交流，共同为教育现代化贡献力量。

为推动我国教育智库建设与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科学研究服务国家重大教育战略决策能力，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长江教育研究院决定携手共建西南教育智库，深化双方在教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决策咨询等方面的合作。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教育学部部长孙杰远与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登台，共同签订教育智库建设战略联盟协议。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柳海民教授、山西大学侯怀银教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马陆亭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高书国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王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申国昌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叶蓓蓓教授登台见证签约时刻。



2. 主旨发言（主持人：申国昌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在会议中作了题为《高等教育强国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分析》的主旨报告。周院长指出高等教育强国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较而言，其高等教育系统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创新能力、人才培养和教育服务贡献能力、治理能力、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高认可度的国家。接着，周院长阐述了其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方法，并通过 CIPP 框架和德尔菲法、结合五个维度，深入分析了世界及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周院

长指出，中国近五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WHEPI 得分大幅增长，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超越日本，逐步跻身高等教育强国行列。



发言嘉宾：

袁振国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

《关于教育强国内涵的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终身教授袁振国在本次会议中作了题为《关于教育强国内涵的思考》的报告。袁主任就教育现代化发展、教育公平及人的个性化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强调，教育现代化需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提升转变，并指出教育公平对缩小社会差距的重要性。此外，袁主任还提到教育不仅是国家发展的支撑，更是培养人的核心，并提出教育强国战略应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注重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族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发言嘉宾：

孙杰远 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教育学部部长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演进》

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教育学部部长孙杰远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演进》的报告。孙校长指出，中国教育现代化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如尊重人性、知行合一和政教合一，同时汲取了西方追求真理、理性与自由等思想精髓，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在近现代受到多种思想影响，包括从教育救国到教育强国的转变，从三育到五育的培养目标，以及学科、经验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孙校长提到，赫尔巴特的主知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动力。在演进逻辑上，孙校长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遵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不断在借鉴中创生、在转化中创新、在反思中超越、在对话中共生。



发言嘉宾：

柳海民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创世方式与增值行动》

东北师范大学柳海民教授在会议中作了题为《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创世方式与增值行动》的报告。柳教授在论坛上提出了基础教育现代化的五大创世成果：立法、立规、立标、立论、立行。柳教授指出，实现基础教育现代化，需要明确的时代站位和方向认知，追求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的优质均衡。同时，他强调了思想方法和思维框架的科学性，提出了大单元、模块式、系统化的思考方式，以及结合本校实际和优势条件，突出个性特色，追求实效的实践路径。在具体行动上，柳海民教授提出了包括学校发展创新计划、文化体系凝炼、德育提质、课程构建、教学改革、团队建设及内部治理创新等一系列措施，旨在推动基础教育现代化向纵深发展，提升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平与卓越。



发言嘉宾：

侯怀银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研究院院长

《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基于思维方式的考察》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研究院院长侯怀银教授在会议上作了题为《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基于思维方式的考察》的报告。侯教授深入剖析了陶行知对教育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方式，强调其立足世情、国情、民情的全面考量，以及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探索教育出路。陶行知提倡的思维方式展现出开放性、动态性、创造性等方面的特征，对于当前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侯教授提出，现代教育工作者应借鉴陶行知的思维方式，实现由封闭向开放、单一向多样、静态向动态、经验向科学的转变，并注重思维的前瞻性，以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3. 主旨报告（主持人：朱晟利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



报告嘉宾：

马陆亭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教育是“硬”的软实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马陆亭在本次会议中作了题为《教育是“硬”的软实力》的报告。他首先对教育之“硬”与教育之“软”作出分析，指出硬实力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强力，软实力则凝聚人心润物无声。其次，他从“规划 - 建设”模式、建设性思维、价值观与方法论、协调两种教育哲学、教育研究的重要作用等六大方面，对“规划 - 建设”中的思想理念进行阐述，提出“规划”代表着对目标、方案、蓝图设计的主观追求，“建设”体现了在达成目标、创造未来、实现蓝图方面的客观探索。最后，他从时代“升维”中的教育发展出发，表明未来是创新取胜的时代，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报告嘉宾：

高书国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等教育现代化布局重构的价值指向与策略选择》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高书国在本次会议中作了题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等教育现代化布局重构的价值指向与策略选择》的报告。他首先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发展与高等教育布局面临的机遇挑战。其次，他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城市群高等教育布局的价值指向：总体布局指向提升综合实力，专业布局指向产业转型升级，层次布局指向培养新质劳动力，学科布局指向提升创新竞争力四大维度。最后，他从体系之变、专业之变、教学之变、育人之变、学科之变五大方面对城市群高等教育布局重构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报告嘉宾：

王柎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中国教育现代化背景下教师的角色定位》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王柎在本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背景下教师的角色定位》的报告。她分析了教师在不同空间的角色定位，主要体现在教师的社会角色、学校角色、课堂角色、自我角色四个向度上。她认为有必要明晰教师在四个空间向度中的具体角色定位，进而助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最后，她阐述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六方面，提出在建设教育强国新征程下弘扬教育家精神，要以教育家精神的自我具身化，助力教师个体向教育家型教师成长。



报告嘉宾：

申国昌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内涵、表征及实施路径》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申国昌在会议中作了题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

内涵、表征及实施路径》的报告。他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历史进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指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六大鲜明特征，即立足中国的民族性、服务人民的公平性、放眼世界的开放性、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服务强国的基础性、引领世界的先进性。最后，他指明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施路径，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条有别于西方式教育现代化、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道路。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杨小微在会议上作了题为《教育现代化的中国内涵与样态》的报告。首先，他对“中国特色”到“中国式”的变化进行了细致探讨，并对“中国式”的内涵进行详细介绍。基于此，他阐述了教育现代化的中国内涵，从字面上对“教育现代化”进行了深入地解读。最后，他从中国教育现代化近期样态概述、中期样态概述、远期样态猜想三方面出发，提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样态构想，并强调展开上述构想的细节，将会涉及到样态定义、系统构成、过程运作、评价调节等一系列的考量。

5月24日下午论坛实录

1. 主旨发言（主持人：李宜江教授 安徽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程亮教授作了题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中国教育学建设》的报告。程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国教育学”的定义及其与教育现代化的紧密联系。“中国教育学”强调了观照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性，因为教育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更是其战略性支撑。从现代化的层面探讨理论建设，程教授提出了比较、发展、结构和系统四个维度，强调中国教育学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更加需要坚持中国特色，勇于创新改革，并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的全面发展。最后，他认为要从问题域、思想源和知识体三方面建设“中国教育学”的理论建设。



宁波大学张宝歌教授作了题为《教育强国视域下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逻辑》的报告。张教授以普通高中为切口，深入探讨了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重要性，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是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一环。在当前形势下，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关系、普及化与均衡化的平衡、以及特色化建设等问题备受关注。同时，办学体制、考试制度、管理机制和课程改革等也成为制约多样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提出要完善民办学校产权体制、推动自主招生政策改革、优化市级管理政策、加强课程衔接政策以及完善校长考评政策等。



南宁师范大学王屹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使命宗旨、逻辑理据与行动路向》的报告。王教授深入探讨了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使命宗旨与逻辑理据，他认为，职业教育应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伟大复兴，助力共同富裕，这既是职业教育的本体使命，也是其历史使命与政治使命。他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性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等方面指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坚实的逻辑理据，并提出了多重行动理路。

2. 圆桌对话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回溯

(主持人：刘远杰副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



朱晟利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朱晟利教授认为，探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审视过去，须认识到现代化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此外，他还从历史学的角度解读了“现代史”的概念，考察了其在不同时期的划分标准和意义，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深刻见解。他认为全球化、科技进步与殖民化的深远影响共同交织，形成了我们对现代化进程的复杂而多维度的学术解读。在这一进程中，语言学和文化视角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现代化背景下语言变迁、文化交流与身份构建的关键视角。朱晟利教授还以教育工业化为例，阐述了工业化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借此强调明确界定现代化概念的重要性，以促进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更准确的分析和讨论。



容中逵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容中逵教授聚焦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文化视角，深入探讨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差异及文化根源，并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深远影响。容中逵教授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出发，梳理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涉及从明末前的独立自主模式到清末的动摇衰败，再到改革开放的文化复兴与重建的历程，并指出中国教育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最后，他提出，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环境中需注意古今融合、中西交汇和价值取舍三大问题。



李宜江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安徽师范大学李宜江教授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百年探索可概括为四个阶段：1921至1949年为自觉的引进阶段，旨在建立革命化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949至1978年为自觉的探索阶段，聚焦于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1978至2012年为自主转型阶段，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2012年至今进入自我完善阶段，致力于建设中国教育

现代化。他认为，尽管“中国式”一词在某些语境中有所泛滥，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提法更为精准地反映了中国教育的独特性和发展脉络。中国教育现代化不仅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进行，更是中国教育独特发展道路的体现。



王彦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王彦教授从时间、状态、文化流变以及空间四个层面来理解现代性。首先，时间维度强调了现代化的起点与转折，展现了现代化作为一种独特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的转变。状态层面的现代性则注重于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的进步，展现了现代化的连续性和弥散性。其次，文化流变层面将现代化视为一个持续统一的文化变革过程，强调了对历史、现在与未来的连贯性思考。

在空间层面，现代化被置于全球语境中审视，特别关注了西方现代性带来的危机与挑战。最后，她强调，即便面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危机，我们依然不应失去对现代化的追求。中国教育现代化需要在回溯历史以及思考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和弘扬中国教育的独特精神文化基因。



李 斌 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李斌副教授聚焦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教育的认识与实践演变。他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历史文献与资料，发现党在这一时期逐步深化了对文化教育的理解，并将其视为推动社会进步与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即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党就提出了新文化、新教育的理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完善。在苏区时期，党将文化

教育提升到方针政策层面，并初步实现法治化，体现了现代化因素。在全面抗战时期，党全面推进文化教育工作，提出并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体系，强调文化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相互联系，同时运用新型教育手段与方法。

3. 圆桌对话二：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当下探索

（主持人：袁梅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袁 梅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袁梅教授结合个人专业背景和区域特色对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现代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她强调民族教育的文化属性和政治权力保障较为重要，并指出了民族教育现代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关键地位。袁教授指出，要加强教育民族性与区域性融合，加快推动民族教育向差异化支持转型，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胡金木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胡金木教授围绕现代化对教育的影响展开深入讨论，指出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应更加关注人的主体性、健康需求以及全面发展。胡教授认为教育应更加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和长远发展，强调在教育中应更加关注孩子的价值感、尊严感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而不仅仅是追求学业成绩和技能培训。



安富海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安富海教授强调学生兴趣培养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之一。学生兴趣的培养关乎学生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的发展，对实现人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接着，他指出了当前学生兴趣的培养面临着多重挑战，大部分学生的兴趣并非自主选择，而是受到家长跟风、学校倾向于用集体

兴趣代替学生个体兴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学生缺乏主体性。这不仅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也阻碍了学生成为具有现代化特质的个体。最后，他提出，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需要关注学生兴趣的培养，关注当下孩子的成长环境。



**张 健 西南大学民族教育与心理
研究中心教授**

西南大学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张健教授提到当前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挑战，他通过海南农业机械化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榴莲种植两个案例来探讨现代化对教育的影响。他指出当前教育普遍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普及可能导致学生缺乏真实的感知和体验，影响其情感发展和社会交互能力。

最后，他提出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学生的真实理解、感受和交互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警惕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确保教育始终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杨 鑫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副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杨鑫副教授指出当前教育现代化的迫切性日益凸显。她从教育公平问题、传统观念的影响、教育质量与规模控制三个方面剖析了当前教育现代化面临的多重困境。对此，她从独立自主、开放合作、注重全面发展、监测和评估四个层面提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现实经验。她指出，在国际发展趋势中，

独立自主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应积极开放合作，并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

4. 圆桌对话三：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未来展望

（主持人：闫若楠副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黄 艳 武汉工程大学教授

武汉工程大学黄艳教授代表其研究团队围绕“长江经济带教育现代化进程指数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分享。她指出，该研究旨在探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教育线上化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和 CIPP 评价理论为主要依据，通过构建一个包含 16 个一级指标、48 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对 11 个省市的教育

现代化进程指数进行了聚类分析、空间特征分析以及一级指标间内外部关联度的分析，深入探讨了各省市教育现代化的现状与特点。最后，黄教授指出，该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也为推进长江经济带教育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游 韵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游韵副教授从她偶然发现的酒标语广告“ORIGINAL BY TRADITION”谈起，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原创与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接着，她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特别是当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思想中，寻找一种更为原发的教育内生性，使传统与现代能够融为一体。她指出，“返本开新”不仅意味着回溯到中国文化哲学的传统之本，更意味着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教育的创新性探索。随后，她通过引入社会情感学习的概念，并结合自己在该领域的研究，展示了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实践相结合。



付卫东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付卫东教授聚焦“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展望与信息化赋能”展开了汇报，强调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首先，付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性，强调其涵盖普惠、公平、优质和活力等核心要素。他结合自己在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的专业背景，深入探讨了信息化对教育现代化的赋能

作用。其次，他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强调了教育数字化在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接着，他指出了教育数字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因交互性不足导致的师生距离感增加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感和抑郁症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付教授与其所在团队开展了人机交互的同步互动和扩大，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李牧川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李牧川教授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未来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并提出了以教育学习尺度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未来观的解决方案。他指出，这种未来观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教育学的独立性和内在价值以及教育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最后，他提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未来

观需要我们引入以教育学习尺度为基础的多元尺度来衡量和构建。我们需要关注教育的本质和价值，关注人的成长和可能性，通过教育来塑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5. 大会闭幕式（主持人：熊西蓓副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



叶蓓蓓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部长

在 2024 桂林·长江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研讨会闭幕式上，叶蓓蓓常务副部长指出，非常荣幸能与各位专家学者相遇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相聚在人文强桂的广西师范大学，共同探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她强调今天这场盛大的学术聚会既是旧朋友相聚，也是新朋友结识，

150 余位师生同场共研，从不同的视角呈现了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深入思考，在学术交流和思想的激荡中，不断丰富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最后，叶常务副部长表达了对未来再次相聚研讨的期待，希望能与各位专家学者再会于民族底蕴深厚的广西桂林，继续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周洪宇院长受邀参加第二届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培养学术论坛



第二届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培养学术论坛现场

4月25日至26日，第二届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培养学术论坛在湖北武汉举办，我院周洪宇院长受邀参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24所高校、96所中学及各相关组织200多位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就大学、中学、社会协同共建拔尖创新人才生态、创新新时代人才培养机制和培养方式、打破学段壁垒，做好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贯通式衔接等主题进行了分享和深入交流讨论。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原主任李志民代表主办单位致辞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原主任李志民代表主办单位致辞。李志民在致辞中回顾了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机制及遇到的问题，对本次论坛的成果寄予了殷切期望。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现场发言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分析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意义，以及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实践与未来方向。周洪宇教授详细讲述了郑泉水院士担任院长的深圳零一学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八中、东莞清澜山学校、深圳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等学校的成功实践。



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原主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教育装备分会理事长曹志祥发言

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原主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教育装备分会理事长曹志祥结合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思路。他指出，找到适合新人才的培养方式、评价方式和选拔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高途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高途佳品 CEO 陈向东发表主旨演讲

高途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高途佳品 CEO 陈向东发表了主旨演讲，陈向东结合个人的学习成长与职业发展经历，以及与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知名学者的交流心得，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作用提出了重要见解。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睿、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金柏江、高途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许翔也先后做出了专题发言。



圆桌论坛：社会实践活动对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式培养的影响



圆桌论坛：高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高中人才培养的衔接机制

本次论坛设置了两个圆桌论坛环节，分别就社会实践活动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大学与中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衔接机制两个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正逐步从知识考核到对能力素养考核，从要求掌握知识精熟到强调学习深度，同时需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构建人才培养多元化投入机制。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营造引导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良好环境，需要不受外界影响，坚持长期主义，让他们有更大时间和空间去试错。在资源上，需要持续的经费投入，强校企融合持续投入，提高基础学科人才的激励强度。

参加本次论坛的知名大学和中学还有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武汉二中、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广东碧桂园学校、韶关始信中学、合肥一中、合肥六中、合肥一六八中学、济南中学、滕州一中、枣庄二中、郑州一中等。



我院周洪宇院长受邀参加南京“八〇九〇后” 基础教育优秀青年教师学术沙龙

5月26日，“八〇九〇后”基础教育优秀青年教师学术沙龙在南京市小行小学成功举办。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受邀参加并致辞。

本次学术沙龙以“问道强国：以高质量教科研推动教学变革与创新”为主题，由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联合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共同主办，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近百余人参会，旨在为全国“八〇九〇后”基础教育优秀青年教师搭建展示成果、分享经验、促进成长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基础教育领域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创新发



我院院长周洪宇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沙龙正逢其时，大家共同探讨如何引导青年教师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鼓励青年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和

前进，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活动不仅具有现实针对性，对构建基础教育教学体系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大伟博士致辞指出，此次“八〇九〇后”基础教育优秀教师学术沙龙的举办是对国家教育战略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对提升教育质量、培养创新人才的坚定承诺，希望优秀青年教师借助本次平台能够分享智慧、拓展视野、交流思想、创新理论。



在学术传承环节，现场播放了“90后”前辈顾明远教授对“90后”青年教师寄语的视频，顾教授希望青年教师以教育家精神引领自身的成长，在锤炼中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中坚力量。“80后”前辈成尚荣研究员寄语“80后”青年教师，希望青年教师始终坚持“四有”好老师的标准，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学习、反思、创新，努力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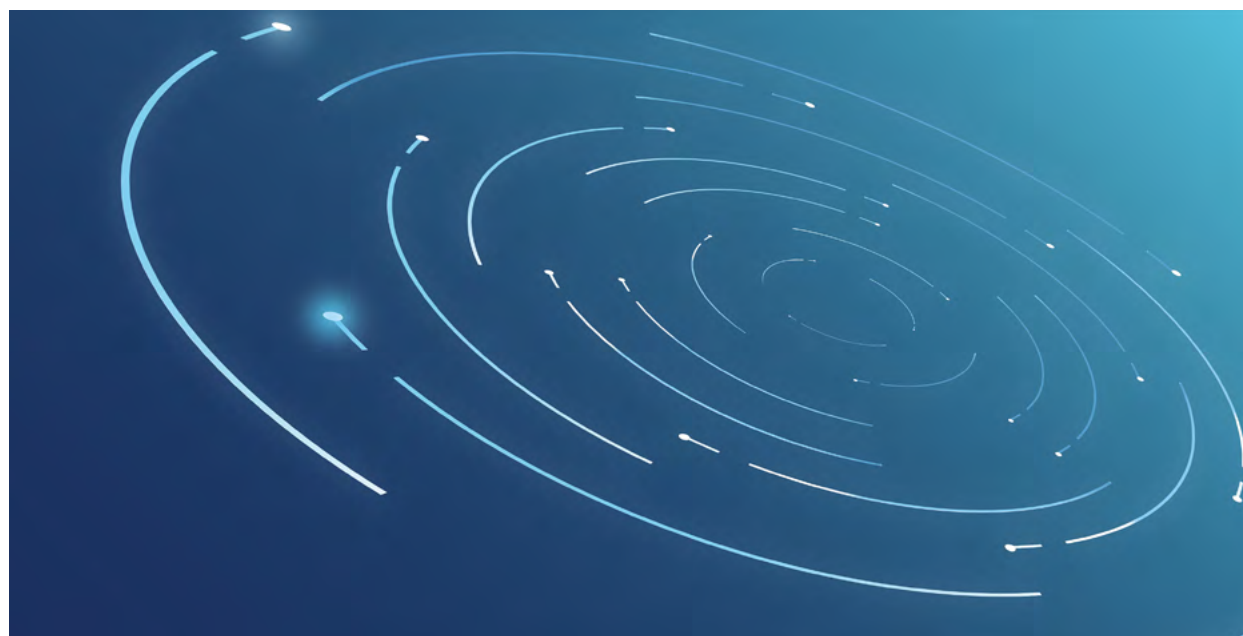
沙龙活动分为青年主旨报告和青年小组汇报两个环节。在青年主旨报告环节，南京市中华中学正高级教师卞姗姗作为“80后”青年教师代表，以“一核三式历史教学法”为题做主旨报告，提出了思维中心的历史教学法是指向质疑的阅读式教学法，是指向求解的情境式教学法，是指向表达的项目式教学法。杭州市天长小学汤璠宾博士作为“90后”青年教师代表通过对研究背景、研究回顾、研究设计、研究过程、研究反思、研究展望的介绍，系统分享了“科学探究能力表现性评价工具的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成尚荣研究员和周洪宇教授对两位青年教师的主旨报告进行了精彩的点评，高度认可了他们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



关键能力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动力，在青年小组汇报环节，1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八〇九〇后”基础教育优秀教师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进行小组汇报，

汇报内容涵盖了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成果，涉及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学科建设等多个方面。青年教师们适应快速变化的教育需求，跨学段思考教育，深入探讨如何在不同学段之间实现知识和价值观的有机衔接，如何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各位专家学者们为青年教师的汇报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和建议，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副局长、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何丽华代表第一小组进行汇报，合肥市第一中学瑶海校区执行副校长、正高级教师肖琼代表第二小组进行汇报。他们分别指出，两组的学术分享各有特色，可圈可点，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学术积累以及教育情怀，对后续基础教育的进一步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促进青年教师更广泛的学术交流，深化教育教学和交叉学科研究。周洪宇教授对本次沙龙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本次学术沙龙不仅为青年教师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思想的平台，更是一次教育智慧的碰撞，期待青年教师们将沙龙中的收获转化为教学实践的动力，为推动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于2006年12月16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202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担任院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本着“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指导思想，“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原则，聚集了一批国内外优质教育专家资源，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依托、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为支撑，“学、研、产、政、社”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型体制机制。

17多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新型教育智库“重器”，努力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更好地为改革奉献力量。自2016年来，连续三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排名稳扎前三。2017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年度中国核心智库”。



联系电话：027-87671389

官方邮箱：cjy2006@cjy.com.cn

官网地址：<http://cjy.com.cn/>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277号湖北教育出版社5楼